



“一个泉眼里岂能发出甜、苦两样水呢。”

作者：邓牧师
译者：刘弟兄

圣经译本所用源文本历史之探究

摘要：

关于圣经源文本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但人们很少思考源文本是否纯正，也很少思考圣经译本所用之各源文本之间的差异。目前，在一种语言中存在太多的圣经译本，比如英语译本就已经严重过剩。译本如此之多，促使人们注意到各源文本之间存在差异，至少认识到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存有差异。普通人以为，圣经一直都是今天看到的样子，即一本大书，里面有六十六卷。他们并不探究其是否纯正，也不思考今日的圣经究竟如何得来。本文旨在挖掘圣经译本的两个主要源头。今日的抄本虽有成千上万，但大致分属两个家族。在各语言中，诸多圣经译本，若非出于一个家族，便源于另一个家族。

导言

人们肯定已经发现，今日销售的圣经版本多种多样。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同一源文本，竟有如此多的译本。其他著作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比如荷马的《伊利亚特》，虽有很多译者殚精竭虑投身在此工作，但译本只有寥寥几个。再以莎翁为例，他的著作蜚声世界，但在同一语言中，译本至多也不过十个。细想起来，莎翁与荷马的著作，意思明确，并无争议，所以译本自然不会很多。那么，圣经译本如此繁多，就是因为其意思含糊，争议之处颇多么？其实，并不尽然。我们以《论语》为例，虽然有些句子读者理解各异，有些地方更是晦涩难明，但其英语译本至多不超过五个。如果读者仔细对照这些译本，就会发现它们意思趋向一致，彼此差别无多。故在中国之外，《论语》译本并未引起人们的争论。虽在中国之内，学者对儒家经典《论语》的某些句子理解不一，但此类分歧并未流传到其他国家。然而，圣经译本的情况却不同，因分歧、差异已经蔓延至各国。不同译者在翻译《论语》时，遣词造句会有差异。一个译者会选择较书面的词，而另一个译者则会选择偏口语的词；一个译者会挑选具体的词，而另一个译者则会选择抽象的词。虽然有措辞上的差别，但意思并未有大的变化。然而，论到圣经，情形则不是如此。若任意挑选两个当代译本拿来比较，就会看

到，差别的地方有五千之多。不仅经文措辞有别，更有整节经文都被删去、整个短语意思完全改变的情况。正因如此，所以自1800年以来，基督教界便因圣经起了很大的争论。信徒们彼此辩论，天主的话语到底在何处，哪个译本才是最佳的。普通信徒认为，在不同译本之间做一取舍是件小事，也不考虑译本的源文本。他们只根据自己的偏好去选择圣经译本，而未认识到这也是一个责任。不明真相的读者，以为一切译本都源自同一文本，只是结果不同而已。所以，本文的目的即是阐明圣经译本之差异的缘由，并使读者明了西方宗教如何因此分裂。

圣经如何保存

想到圣经，我们自然想到犹太人，因为圣经四分之三的内容都是关乎犹太人的历史，其余四分之一则是以预言的形式讲述他们的死而复生，以及将来的国度。所以，有人说：“圣经就是犹太人的书”，这话一点也不为过。圣经本身就证明它是源自犹太人的经典。摩西是犹太人的一个领袖，他写了旧约的很多书卷。摩西少时住在盛极一时的埃及，年老时，他从天主耶和华那里接受律法，转而赐予犹太人遵守，后来撰写了旧约的前五卷，即为摩西五经。自那时起，犹太人，具体是犹太社会中的利未人，承担起保存圣经的责任。他们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呕心沥血，将天主的话语忠实地传承下来。他们用心之专，致力之勤，文本保存之确，实为罕见。将他们的文本与近来发现的死海古卷做一对比，发现两者并无差别，惟有少数标点模糊而已。其中没有一个词语缺失不在，没有一个短语抄录错误。那些抄录经文的人，必须遵守严格的规矩：

- 必须用洁净动物的皮子抄写圣经（洁净的意思是符合旧约的卫生条例）；必须由一个犹太人来制作；必须使用取自洁净动物的线，将皮子捆扎在一起。
- 每一栏的经文不得少于四十八行，不得多于六十行。抄写之前，需要先在抄本上划出直线。
- 墨水须是黑色，不得掺其他颜色。墨水必须按照特殊的方子来制作。
- 抄写员不得根据自己的记忆抄写经文。抄写员面前必须有正确的经文。在抄写之前，他须大声朗读每个词语。

- 每次在写“天主”（艾罗欣）之前，他必须恭恭敬敬地擦净他的笔。每次写“耶和華”之前，他必须全身沐浴，免得污秽天主的圣名。
- 抄写时用什么字体，字母之间、词语之间、段落之间应当相隔多少，抄写者当如何用笔，所用动物皮子当是何种颜色，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都有严格的规定。
- 抄写完毕之后，若要修正任何错误，必须在三十日之内，不然就全然作废。一页内若有一个错误，整页就不可用。一页内若有三个错误，整卷书都不可用。
- 抄写者须数一数有多少字母，多少字。若有一个字母漏掉，或有一个字母多余，或两个字母挤在一起，整卷书就都作废，须马上毁掉。

既然抄写圣经的时候，要求如此之严，规则如此之细，为何现代的译本竟有如此多的差异？为何前人一丝不苟保存下来的抄本，竟产生出几百个不同的译本呢？在英语中，单单希伯来语的圣经，译本就多达两百个。在中文里，译经历史虽然较短，但译本也有三十多个。此外，我们须注意，犹太人只承认一个抄本是正确的，就是马所拉文本。犹太人最早的经卷出现在主前1600年，自那时起，犹太人一直倚靠同一本希伯来语圣经；直到现在，耶路撒冷使用的还是这本圣经。真是不可思议。在全世界中，最老的、且中途未断使用的书面语言，就是希伯来语。真让人匪夷所思。

后来，基督诞生，教会建立，新的时代开始，新约问世。新约有二十七卷书，由不同的人写成。大约在主后六十年，新约书卷完成。从古代到这时，一直是犹太人负责撰写和保存天主的话语。新约几乎都是犹太人写的，只有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医生路加撰写的。圣经的抄写和翻译，基本上都是在耶路撒冷或安提约完成的。而最早的两个教会，就是在耶路撒冷和安提约。需要再次申明的是，到此时，无论是翻译圣经，还是保存圣经，都没有外国人参与，都是犹太人做的。罗马书第十章说，圣经是藉着犹太人的手传给世人的。

“更晚的”、“更好的”抄本

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希伯来语抄本和希腊语抄本一直都没有变化。虽然有一些书如《多比传》、《巴拿巴书信》、《以诺

书》流传在世，但都是人伪造的，犹太人根本不予承认，虔诚的圣经学者也不予接受。虽然犹太教和基督教内一直都有分裂，但多数信徒都一致拒绝这些书卷。到了今日，惟有天主教会宣称这些书卷是天主默示的话语。关于旧约，有马所拉文本，人们没有争议。关于新约，也有人们普遍接受的文本，后来被称作“公认文本”，也没有争论。基督建立教会，门徒传承他的工作，后来受逼迫分散到各地，之后才有人质疑圣经抄本的源头。在安提约，在教会的带领下，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道，为基督做见证，也有圣经传播到各地。但在亚历山太城，若干学者成立了一个学会，由两个著名学者带领，即革利免和奥利金。就是在此处，另一个圣经源文本诞生。这是偏离圣经的第一次明显举动。这个源文本没有马所拉文本的历史，没有希伯来抄写者的仔细的规则。实际上，这些源文本唯一的支持者就是组织的教会，即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和来自亚历山太的学者们很快要建立的国家教会。我们要注意，虽然亚历山太抄本在早期教会时代就已出现，但很晚才真正问世，具体是1609年天主教出版的圣经。我们不是说，这些抄本在1609年之前不存在，而是说，研究圣经的诚实人不会看这些抄本，更不会考虑用它们代替原来的马所拉文本。罗马国教，即天主教会，建立之后，西方世界开始堕落，进入了“黑暗时期”，时间长达一千年。在此期间，教会与国家联合，搞独裁统治，而背后的支持者就是亚历山太的学者。真教会和真圣经，为躲避罗马国教的逼迫，转入了地下。但在此一千年的暴政期间，全世界各处都有圣经的翻译，像法国和荷兰因为有圣经就有了自由和光明。真的圣经到哪里，哪里就有平等、自由、独立。然而，国家教会四处追杀他们，制造了很多惨案，如圣巴多罗买日大屠杀，天主教秘密组织仅此一次就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真基督徒。天主教以为，他们藉着逼迫的手段，已经将原旧的安提约抄本的威胁压制了下去。虽然天主教有自己的学者版圣经，但他们基本上不用，主要因为人们一旦知道真理就会威胁国家教会。在黑暗时代，普通的大教堂都有圣经，但均用铁链拴在讲台上，免得好探究的人从中获得太多信息，知道自由。此时，中国比较繁荣，但西方世界哀鸿遍野，到处都是烧死人、吊死人、淹死人等各种凄惨的情况。而天主教没有用酷刑杀害的人，都得到了黑死病的精心“照料”。这一切都是拜新的抄本所赐，都是它酿成的恶果。当天主教听说英王钦定本圣经正在翻译中，他们就惴惴不安了。在钦定本圣经问世之前，他们抢先出版了自己的英语圣经。这个搞笑的圣经就是杜埃兰斯圣经。如果有人不确定天主教是否真的有此意图，可以

问问盖伊·福克斯。他是个耶稣会教士，曾试图炸掉钦定本委员会聚集的地方。

亚历山太抄本在第一世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后来在罗马帝国早期以完整版出现了，就是耶柔米的拉丁文圣经。再后来，就是在1609年的时候，又出现了，就是英语的杜埃兰斯圣经。在18世纪末期，它又出现了，就是德国高等批判。

文本批评学的问世

此时，圣经的抄写和传播，落在了基督教会的肩上。虽然解释某段经文可能需要学者，但保存天主的话语则不需要学者。安提约式文本和亚历山太式文本的主要区别是心态的差异。旧约时代，希伯来抄写员的态度是，在地上的天主的话语是完美的，因此他必须一丝不苟地记录每一个标点，每一个字，必须是精准无误的。改变圣经或更新圣经，在犹太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但亚历山太的学者认为，地上没有这样的圣经，学者的工作是在抄写和翻译的时候进行解释。因此，他接受任何抄本为正确的，而不考虑是否伪造。安提约式文本和亚历山太式文本的根本差别就是在此。前者相信，天主的话语已经在地上，只需要抄写和保存即可。而后者相信，需要学者在几千个抄本中为人类找到天主的话语。亚历山太式文本的传播，及版本的不断更新，正是基于这个前提。自1611年钦定本圣经问世至今，这种批判的态度已经很盛行。在此运动中，有两个著名的带头学者，就是威斯科特和霍尔特。他们两人虽然承认英王钦定本圣经和所用的抄本（马所拉文本和公认文本）是大众都接受的，但他们仍说需要一个新的译本。他们认为，所有能找到的抄本，无论是可靠的，还是有问题的，都应当去研究。然而惟一的问题是，这两类圣经抄本是完全不同的抄本，而不是存有差别的同一种文本。他们对整本圣经做了修改。结果，他们做出来的文本与教会使用长达一千年的、大家公认的多数文本，在五千处地方存有差别。他们依赖学问做出的这抄本（而不是马所拉文本和公认文本）正是现代每个译本的源头。注意威斯科特致霍尔特的信中的话：

“我们修订新约，目标是制作一个大家普遍使用的文本……既有此目标，我们应当在公认文本上做某些修正，并照格里斯巴赫的方法在旁注上写上‘可能’、‘值得注意’等字样。如此做，岂不是最佳的方法么……”

让我觉得极大耻辱的是，现今发行的圣经是伪造版，所以我很想提供一个版本，取而代之。即使我们有经验和知识，这版本也不能是单单依赖我们学问的任何版本。这版本须有大量清楚证据作支持。旁注可充分展示我们的智巧或原则……我的希望是依然留下广受欢迎的公认文本，除非有些地方明显错误。”

他们在旁注上对经文进行修改，藉此显明他们对流传了一千年的圣经的攻击。研究者当记住，对天主的纯正话语的每一个大的偏离，都会加一个短语“抄本有”。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出他们抄本之偏差，但我们应注意，这二人虽被称为学者，干的事却没有学者风范，因他们没有提到他们判断公认文本和马所拉文本的标准。那标准就是他们从垃圾桶里捡到的完全不同的抄本。他们的可恶之处是，他们的文本与教会公认的文本虽有差别，但他们不诚实地保留公认文本。若整节经文不存在，他们就将上下文的一节分成两节，好掩盖他们的编辑。所以，今天普通的基督徒没发现，新的圣经所用的抄本与钦定本、京委本所用的抄本是不同的。高等批判问世之后，学者们寻找更多的抄本，更老的抄本，模糊难解的抄本，伪造的抄本，只有部分书卷的抄本，以及让人怀疑公认文本的任何东西。他们花费很多精力，寻找互相对立的抄本，一些彼此冲突的源文本，如七十士译本和死海古卷。今天，圣经的真正话语是在云端，是人不可知的，只有那些有最高学问的人或者看过最多抄本的人才能知道，他们能决定天主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所以，1890年之后，中国出现的译本都有这样的思想，都写着“抄本有”的话。但在这话出现之前，人人都认为，翻译圣经就会依靠马所拉文本和公认文本，而非那个在十九世纪的梵蒂冈的垃圾桶里找到的可疑文本。1475年，有人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了梵蒂冈抄本，但它显然不是很好，所以在1844年它又被提辛多夫在一个垃圾桶里找到。霍尔特，与现在的学者不同，并不敢说他的抄本与马所拉文本一样。他称公认文本是“恶劣的、坏透了”，他抨击安提约的学者路西恩和他的翻译。但路西恩保存了圣经文本，要比威斯科特和霍尔特强百倍。

在一个好的译本出来之前或者之后，虽然它影响很好，被众人接受，但学者们总会又做一个译本，就是败坏的高等批判的圣经。当英王钦定本委员会决定依据一直有好声誉的抄本翻译圣经的时候，杜埃兰斯圣经就在1609年出版了。当京委本圣经在1874年出版之后，虽然它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大的影响力，但和合本委员会还

是决定重做一个译本。若他们目标是取代那“恶劣的”圣经，正如霍尔特所说的，他们为何攻击那好的圣经，却在翻译中又依赖它90%的内容呢？和合本委员会没有资格，若离了施约瑟翻译的京委本圣经，他们便不能翻译希伯来语的旧约。难怪白汉理感到震惊，因为京委本已经被一代人使用，和合本却要取而代之。

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历山太式文本从不会延续太久。我的意思是，今日还有多少人研究杜埃兰斯圣经？天主教赶在钦定本之前匆忙出版了自己的圣经，但他们翻译的很差，所以到了1752年，他们便彻底修订杜埃兰斯圣经，以让人觉得更像钦定本圣经。钦定本圣经却一直未修订，只更新了少数词的拼写方式。新的圣经为何有如此大的更新呢？因为他们说，圣经越更新就越好，所以需不断更新。到现在，原初的和合本圣经已更新了十多次。今天有原始的和合本、新标点和合本、更新版、修订版，还有好几个完全重做的版本。在英语世界，情况也是一样。新的译本每年都会出来好多，据说要取代之前的所有译本。然而，四百年过去了，钦定本仍然是最畅销的圣经，销售量超过所有新的译本总和。可见，这两类完全不同的抄本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圣经，也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不同源文本的重要性

有些人认为，两个不同源文本的差别不是很大，揭露它们和为此辩论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五千多个差别，起码是值得研究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知道，宗教教义就是建立在圣经上。学者们当明白，不同宗教团体之间存有诸多差异，皆与他们对圣经的看法密切相关。以中国道教为例，教徒虽共有一本经卷，却有很多学派。单解释同一个文本，就有分歧和派别，何况我们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本。这两个源文本产生了三个主要的差别：

1. 态度的差别：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对圣经的态度是完全对立的。亚历山太式文本是建立在学问的原则上，因此，只要发现了一个新抄本，能给圣经中的不合理故事（比如驴子说话、处女怀孕、红海分开）解套，学者就要求重译圣经。那些根据亚历山太式文本翻译的很多圣经，已经显明了这一点。在早期教会中，纯正的抄本促使人们火热地服事主，信仰大有力量，以致马丁路德后来发明了

一个口号：“惟独圣经”。他们对圣经抄本的态度是，天主保存了这些抄本，它们是关乎教会中信仰和实践的惟一权威。但亚历山太的学者们认为圣经的话语已经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需要学者们将它们找回来，把它们拼在一起。他们完全否认天主会保存圣经。今天，所有用亚历山太式文本去翻译圣经的人，都有这样的态度。如今，没有人相信和合本圣经是天主的完美的、纯正的、纯净的、无瑕疵的话语。为什么？因为和合本委员会的态度，他们说1902年刚印刷的圣经需要更新。纯正的、纯洁的抄本被视为是天主的，因此不需要更新地名和人名，不需要调整语法以符合现代用法，不需要将标点更新为21世纪的人接受的标点。钦定本的标点、语法、词汇已经不合今天的标准，但是一点也不损害其销量。钦定本圣经在英语世界里是标准，与它的翻译优美没有关系，与它的卓越也没有关系，虽然它的译文是优美，是比别的译本卓越。与什么有关系呢？完全与人对天主话语的态度有关。这态度是：“天主能在任何语言中保存他的话语。”

2. 教义的差别：

因为源文本有差别，所以圣经译本自然会影响到教义。许多大宗教都相信玛利亚是基督与人类的中保，她是无原罪的圣母。但一些小的基督徒团体则谴责这样的教义。为什么？因为一类抄本支持这个观点，而另一类抄本谴责这个观点。他们用的源文本不同，所以自然不能同意。你必须认识到，婴儿受洗的教义、国家教会的教义、告解的教义、赎罪券的教义、教皇权柄的教义、炼狱的教义、圣水的教义、自我鞭笞的教义，都不能在安提约的圣经抄本中找到。难怪，天主教需要他们自己的“学者版”圣经，以支持他们不合圣经的教义。不要误会了，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团体编写一本圣经，以支持他们的教义，而另一个团体也编写一本圣经，以支持他们的教义。我们说的是，天主真正的、纯洁的话语，永远定好了具体的信仰，一个团体完全接受，但另一个团体不接受，所以他们制作自己的圣经，以支持他们的观点。现在，我们开始完全明白此争议为何很重要。如果问题的关键点是教义的差别，我们就不应当将和合本与京委本做比较，因为两个译本不是出自同一个源文本。我们应当问自己，哪个出自纯正的源文本，哪个不是。我们关心的不应当是他们如何翻译圣经，何时翻译的圣经，是否使用了现代的标点，所用的词是否过时，用什么词来翻译天主。我们只应当关心一件事，京委本用了什么源文本，和合本用了什么源文本。

3. 结果的差别：

源头不同，结果自然会不同。正如苹果树结苹果，桃树结桃子，照样，圣经的根源不同，结的果子也就不同。安提约的纯正抄本，结出了好的果子，它产生出14世纪法国的刚强的基督徒，产生出1611年问世的、改变世界的钦定本圣经，使基督徒忍受了天主教的逼迫，而且生存下来。当时，天主教烧死了迈尔斯·科弗代尔，也将丁道尔的骨灰扔在泰晤士河里。它在1874年的京委本圣经中统一了圣经术语和地名。它兴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当时路德就是阅读了罗马书第一章。它建立了一个国家，当时有一群浸信教会的信徒在约翰·鲁宾逊的带领下，逃到北美。它创立了一个国家的宪法，当时以撒·巴克斯骑马走了三天，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木匠厅，呈递了一个由相信圣经的人签署的宪章，内容就有美国新政府当给人民宗教自由。它在太平天国作乱期间和义和团暴乱时期鼓励基督徒坚守真的信仰。所以，这个抄本的果子是显而易见的。而亚历山太式文本，则在历史上结出了坏的果子，对教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它催生了法国革命，使百姓完全抛弃了道德，因为天主教试图用暴政控制法国人民。在中国，它导致了教会与政府的联合，即三自会，其后一直负责和合本的印刷。它产生了在德国境内猖狂肆虐的高等批评，这高等批判否认大鱼吞吃约拿的故事，也否认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复活。使用亚历山太式文本的人是怎样的人呢？是如奥利金的人，他阉割了自己；又如威斯科特和霍尔特的人，他们不相信处女生子。最起码，它叫人怀疑天主的话语，也教导每一个男人、女人、孩童：圣经的最佳审判者是个人。

源文本如何影响了中文圣经的翻译

现在我们要触及问题的核心，即源文本如何影响了中文圣经的翻译。威斯科特和霍尔特所用的两个败坏的抄本——西乃抄本和梵蒂冈抄本，在19世纪中叶已经在传播，但理性的学者在翻译圣经时不会考虑使用。马礼逊和马士曼在1822年和1823年分别出版了他们的文理译本，里面没有提辛多夫所发现之亚历山太式文本的一丁点影响。我们无需说明他们使用了何种抄本，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只有一个可信的文本。天主教在19世纪也承认他们与主流基督教的差别，在雷永明的带领下，他们于1935年出版了一本中文圣经。很好笑的是，像利玛窦这样的天主教徒很早就想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但他们觉得圣经没什么益处，所以一直没有付诸实践，真正翻译圣经却是很晚之后的事了。然而，那些相信圣经至关重要的人，一有机会就着手翻译圣经了。马礼逊、马士曼、高德、施约

瑟、米怜，都将翻译圣经视为他们的第一要务。马士曼最早将全本圣经翻译成中文，之后很多人也翻译了圣经，但在1902年出版的京委本之前，所有译本，包括京委本，都出自同一个文本。当时的译者就如何翻译一些词语（如天主、洗礼、教会、灵）起过争论，但他们从未就圣经的源文本起过争论。当北京委员会翻译的第一本白话文圣经问世之后，50年来译经的工作终于划上句话，人们终于可以休息，终于有了一本可用的圣经。他们的译本终于将地名和术语固定下来。虽然某些争议还未解决，比如怎么翻译天主，但是这本圣经非常成功。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天主的话语成功地进入一个文化之后，败坏的亚历山太式文本就会尾随而至。1890年，一个委员会成立了，他们使用英语圣经（英语修订版圣经）做底本，要翻译出一本比京委本圣经“更准确”、“更有学问”的圣经。他们的选择是明显的，体现在他们翻译的一些经文上，这些经文的翻译偏离了亚历山太或安提约的任何抄本。在出伊及记，英语圣经有个短语是“abomination of the Egyptians”，它是何意？就是出伊及记的作者称伊及人所敬拜的（名为阿皮斯的牛）为可厌恶的，可憎的。但和合本委员会不明白英语的意思，他们翻译为“埃及人所厌恶的”，而不是京委本所译的“伊及人所敬拜的牲畜”。此外，让人诧异的是，京委本委员会在1865年决定翻译圣经，他们只用了六年就出版了新约，到1879年便译完了旧约。和合本委员会在1890年就成立了，但到1912年才译完新约，到1919年才译完整本圣经。他们可以说，他们用的时间长是因为他们的学问比京委本委员会的更高，但事实是他们就如何翻译有分歧。曾有一时，和合本委员会好像要走委办译本委员会的路，就是产生分歧，彼此不能同意，最后分裂，翻译的圣经不可用。开始的时候，几乎有一半的人出于不同原因离开了该委员会。其实，他们很“没学问”，所以他们在翻译旧约时大量倚靠京委本的内容，而且在1912-1919年将和合本的新约与京委本的旧约订在一起出版，好被中国的基督徒接受。这个决定好像是打了1902年的京委本一记耳光。这个新译本是完全不必要的。和合本迎合的是人的智慧；教会希望与天主教不同，和合本便投其所好。京委本使用“天主”的称号，也允许“上帝”和“神”。但和合本只使用“上帝”和“神”。讽刺的是，和合本使用的抄本是教导天主教教义的、属于天主教的抄本，他们却不使用“天主”，以此假装他们反对天主教。无人问他们用的是哪个抄本。中国基督徒经常在旁注里看见“原文有”和“抄本写”的字样，慢慢就习惯了，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

译本不过是译本，决不会是完美的，和合本是更好的译本，因其时间更晚，且是从英语翻译过来。今天，人们判断所有译本，都将它与和合本对比，看中国人能否接受。但这是与历史上其他任何团体相反的，因其他团体相信源自马所拉文本和公认文本的纯正圣经。人们怎么想从来都不重要，语法怎么说从来不重要，有多少学者的贡献从来不重要，什么是“更接近”原文从来不重要。主要的目标是，将那完美保存的抄本中的完美的话语拿过来，翻译成可理解的中文。语法会改变，人们对文本的看法会改变，但天主的话语是不改变的。对高德版圣经、米怜版圣经、马礼逊版圣经、京委本圣经的攻击，关乎的总是语法、标点、中国的基督教对某术语的看法，而非译本源自哪个抄本。

时至今日，几乎每一个新的译本都离不开和合本，原因有两个：第一、教会让文化（而非源文本）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圣经，第二、人们习惯使用的圣经，不允许改变。今日在美国，普通人都喜欢没有“大男子味”的圣经，所以他们将天主的男性代词改成了中性代词或女性代词。今天，保守的基督教快要死去，多数人不喜欢圣经谴责罪恶，如奸淫、鸡奸、淫乱、懒惰，所以他们喜欢更温软的、更易接受的圣经。如果大众接受的变成了我们的标准，那任何一个译本都不会用太久，因为社会在变，所以译本会一直跟着社会变。在中国，如果人选择和合本而非京委本的惟一理由是大众接受，我们就必须承认，这是一点也没有学问的。任何深思的人，都要看看译作的源文本，来决定它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老子》或莎士比亚的著作也是一样。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帮助我们知道京委本和和合本的主要差别。和合本圣经90年来一直处于垄断地位，人们在此争论中能找到答案。

结论：

我们从中能学到什么呢？简而言之，除了一个方面，就是所用抄本之外，和合本不能在其他任何方面与京委本相比。出自亚历山太、埃及、安提约的抄本大为不同，人在贬低某译本或称赞某译本之前必须考虑到这点。但是今天，中国人完全忽略了这问题。中国的多数圣经都源自纯正的抄本，比如马礼逊译本、高德译本、马士曼译本、米怜译本、麦都思译本、裨治文译本、京委本、委办译本。只有一个著名的译本来自亚历山太式文本，就是和合本。人不由得想，中国有可能会滑入到欧洲中世纪的情况，即惟一的圣经就是天

主教认可的圣经。今天，看一个圣经是否是好的，只看他们怎么称呼天主，人们是否会接受。毋庸置疑，这与中国人思维之核心，即集体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但人们必须记住的是，和合本在被中国的基督徒“普遍接受”之前，京委本已经被中国人接受和喜爱了五十年，之后才被和合本取代。代表白话文标准的巴金、胡适、鲁迅，及其他很多人，曾高度评价京委本（他们说的就是新旧约全书）。京委本出版之后，美国圣经协会在一年内卖出的圣经是最多的，超过了其他语言的圣经，创下了记录。牧师们曾说，他们在天坛门口，在长江岸边发圣经。所以，说中国人不接受京委本，这话是错的，因为他们好多年里都是接受的。与京委本相比，和合本拥有的惟一优势是它的垄断地位，那是因为基督徒不知道和合本的真正根源，过去九十年它完全垄断了市场。我们必须陈述此话题，因为在全球每一个重要的语言中，都至少有两个代表性的圣经，代表了两个相异的文本。只有在中国，这个事实被忽视了。排除个人喜好，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代表了被教会长久使用的安提约抄本的译本是必要的。

新盼望浸信教会
xinpanwang.podbean.com
xinpanwang@126.com